



一個平凡人的自述

成功高中圖書館



0029998



季 蕉 森

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 (1956)
台灣省台北市成功高中畢業 (1952)
浙江永嘉建華初級中學畢業 (1949)
一九三四年出生於江蘇省鎮江焦山
祖籍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

一九九九年退休，現居美國馬里蘭州
美國海軍太空作戰系統指揮部 (SPAWAR)
美國通訊衛星公司 (COMSAT)
曾任職於美國IBM
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 (1976)
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航空工程碩士 (1962)

母校贈
成功高中
車志存

高五班校友
季子蕉
9/27/2010

憶好友王大眾

一九五〇年代以前，在故鄉溫州是沒有人說普通話的，即使有人會，也不講，大家祇講溫州話。民國卅六年（1947），我在溫州建華初級中學唸初二，現在它已改稱為「溫州實驗中學」。春季學期開始，班上來了一位新同學王大眾，他不大會說溫州話，祇講帶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話，引起全班對這位外來新同學的注目與好奇。由於語言上的不方便，所以開始時，大家跟他接近不起來。不到兩個禮拜，我收到父親從臺北來的信，告訴我有一位親戚，不久前從江蘇搬回溫州，他的孩子叫王大眾，這學期已轉學到我的學校，可能成為我的同班同學；父親還告訴我說，他跟我都是出生在江蘇鎮江的焦山，而且是生於同一幢房子，但他比我早出世五個月。有了這一層特殊的關係，我與大眾就慢慢開始接近，他的溫州話亦一天比一天有進步了！

我住校，大眾通學。我個性內向，他似乎比我稍微外向一點，很穩重保守。我倆與駱正顯，田光華兩位同學，都對數學這門課感到有興趣，彼此時常在一起討論作業上的問題，因此大家的友誼與日俱增。逐漸地，我跟他們都變成了很接近的學友。記得初三時，有一天陳紀方校長來代國文課，教袁枚（公元1716至1797）的「祭妹文」；陳校長不但把該祭文中哀悼之情，抒意詳盡，感人動聽，而且自己的眼眶也變得紅紅的，不時拿出手帕拭淚，使這堂課留給我們一個極其深刻難忘的印象。下課時，我與大眾均為此祭文淚眼相對，感觸良多；我體會出，大眾亦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！那個年代，學校有春季班與秋季班之分，我們是春季班。民國卅七年（1948）十二月間，初中畢業，我與大眾同窗兩年，彼此的友誼，認識與了解，均更進一步。

我與父母親分開已有好幾年了，很想回到雙親的身邊，去臺北考高中；但大舅舅要我留下來，認為三年一下子就過去了，就在溫州把高中唸完之後，再走亦不遲。大眾的父母親早於一年前，已帶著第三兒子廣眾去了臺北，留大眾與他的二弟群眾在溫州上學；所以，大眾亦很想去臺灣唸高中。當然，兩家父母親都希望自己兒子早日去臺灣團聚。當時，國共內戰正如火如荼地展開，溫州的市面與民心已開始有浮動不安的現象。我倆年少，對時局都不懂，也沒有興趣，所以根本不把時局作為我們考慮去留的因素。大眾與我商量後，就決定準備帶著他小學尚未畢業的二弟群眾，三人一起去臺灣。那個時候，我們三個人的歲數加起來還不到四十一歲。

當年溫州對外的交通，既無飛機，又沒有公路或鐵路，祇有與上海之間的定期輪船。上海與臺灣之間有定期的輪船，或許也有班機。我們三個未成

年的小孩，在沒有大人陪同的情形下，如搭輪船去上海，大概還不會有問題，可是我們到了繁華的上海，如沒人幫忙照應，買船票去臺灣，一定成問題；聽說因時局的關係，從上海去基隆的船票，要有關係或買黃牛票才行，這對我們更是一個大問題，所以無法經由上海去臺灣。大眾與我為赴臺的事，沒有大人在旁幫忙，我的長輩親戚們又都在鄉下，遠水救不了近火，搞得一籌莫展，不知如何是好？有一天，我倆在溫州城裡閒逛，忽然間，看見一根電線桿上，貼了一張紅紙條，上面寫著某機帆船定於民國卅八年一月某日（忘記了日子）直放基隆及接洽地址等字。我們唸完之後，不勝雀躍，高興的不得了！真有「天無絕人之路」的感覺。不知是誰建議的，要我們最好帶一盒廿包裝的「前門牌」的香菸去買船票，較為有利；於是我們照辦，很順利地辦妥，香菸有沒有發生作用抑或白送了，也不得而知。行期定了，由我去電報向在臺北的父親稟告離溫的日期；因為是機帆船，父親無從查知我們抵達的時間，故無法至基隆港來接我們，雙親祇有在家等待我了。

開航那天的凌晨，在黑夜裡，我們僱了兩輛人力車，從大眾住的地方，連人帶行李，一直拉到溫州的朔門碼頭；抵達後，再僱小舢板，把我們送上那艘停在甌江中，等待起航的機帆船。江風吹來，覺得冷颼颼的。我們三人擠在一個艙位裡，行李另放一處。安頓後，發現除了我們之外，沒有其他乘客。一位船員來囑咐我們，不可以從船艙裡爬到外面去；我們是小孩子，當然聽大人的話。艙裡沒有一個鐘，我們也沒有手錶，所以不知道是什麼時辰，祇曉得外面天還是黑漆漆的。大約不到一小時，甌江的潮水漲完之後，聽到馬達響，船起航了！這時大眾與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，就是我們告別故鄉了！

船離開甌江後，風浪逐漸增大，猜想一定是進入了臺灣海峽，還好我們都挺得住，沒有嘔吐。一天一夜之後，平安地到達了基隆港。那時雖不需要入境証，但還是要看一下有關的証件；我們三人都沒有身分證，就以我與大眾的兩張初中畢業文憑為証件上了岸。上了火車後，我既不會說普通話，又不懂閩南語，心裡怕坐過了站，於是馬上用鉛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：「我要在台北下車，」遞給旁邊一位大人看，他笑笑地點點頭，表示懂了我的意思，我與大眾才安了心。結果這位先生真的幫了忙，使我們順利在台北下了車，於是立即叫了兩部黃包車，我們三個小孩子總算順利，平安地與自己的雙親家人團圓了！

民國卅八年（1949）一月間，我與大眾一起進省立臺北成功中學，上春季班高一，並相鄰而坐。每天他都是騎自行車上學。放學時，如果不是下大

雨，他先不騎車，一定陪我步行至濟南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處，分手後，他才騎上車回家去，三年如一日。在每天放學並肩步行回家這段時間裡，我們有說不完的話，例如課業，同學，師長，學校，家庭，社會，國家，還有往事等等，無所不談；是我們最享受的時刻，也是我們友誼成長與感情培養的時段。

我們倆人在班上數學的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的。三角的俞玉梅老師，對我與大眾的成績很讚賞，這亦無形中給我們更大的鼓勵。在課堂上，如有同學提出問題，俞老師有時會先問我或大眾會不會？我們都沒有令俞老師失望過。高二與高三的數學老師是鄭德峻先生，一次解析幾何小考，鄭老師出的全是難題，班上祇有極少數幾位同學及格。我那次意外得了滿分，而大眾竟然是不及格。鄭老師還在班上提到：「有一位同學應該考得很好的，結果這次亦不理想，還要多多努力。」大眾並沒有氣餒，從那天起，幾乎每天放學以後，我倆必定留在教室裡，開始把所學過的解析幾何重新複習一遍，有較難的習題，亦再做一次，一直到他的信心恢復才停止。果然，我們的努力見效了，另一次的小考，大眾跟我都得了九十分以上。鄭老師這次還特地在班上讚揚大眾說：「我知道他上次考得不理想，是意外的。」這已是將滿六十年以前的事，前年一位在臺北的同學黃國樞與在美國的同學范揚鉅先後對我說過，大意是：「你跟大眾那麼要好，倆人在課堂上又併坐在一起，結果那次解析幾何考試，你得一百分，大眾不及格，同學們對你們不作弊，印象很深刻，亦很佩服你們兩位。」沒有想到，當年我與大眾留給同學的形象，半個世紀後我才知道。

民國卅九年（1950），正是政府從大陸播遷臺灣的初期，公教人員生活很清苦，有的還被政府遣散，大眾的父親與我的父親都遭遇到同樣命運。兩家於是都開了所謂「活動商店」，這是當年在臺北才能聽到的名詞，就是活動攤位。我領有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臺北分局民國卅九年五月廿六日發的「公北業字第 2692 號」香菸攤販執照，至今我仍保留著，作為永久紀念。那個時期，大眾與我平日除上學與做功課之外，晚上跟週末還要協助自己的父親做小生意，我倆都很顧家。記得一個週日下午，我去他家的「活動商店」看他，因天很熱，大眾遞給我一瓶當年最流行的冷飲，黑松汽水，要讓我解渴，我立即請他收回去，並笑笑地對他說：「你還是留著賣吧！」當年那一瞬間的互動與彼此的表情，永遠停留在我的記憶中。總之，我倆每天忙碌，但不知愁，還是很開心的。

同年十一月間，我們班上的姚谷良導師（1912 - 1993），他就是名書

畫家姚夢谷先生，要帶大家去碧潭遠足。當時絕大多數同學都是騎自行車，直接從臺北去碧潭相會。大眾有自行車，而我是一位不會騎車者；他爲了我，寧願放棄與其他同學一起，去享受長程騎車樂趣的機會，情願陪同我搭火車去。大眾就是這樣一位很爲朋友著想的人。那次的碧潭遠足，很榮幸潘振球校長與曾憲鎔訓導主任亦同來參與，我們曾在碧潭的吊橋附近攝影留念。

民國四十一年（1952）一月，我們從成功中學高中畢業。同年夏，升學考試，我倆均報考機械工程。很幸運，我進了臺大；但大眾那次不幸沒考上大學，我很爲他惋惜；想到今後，我不可能再有機會是他同班同學，心裡難過了陣子。翌年夏，大眾再一次報考大學。這次他考進了國立成功大學的前身，省立臺南工學院的機械系，他家人與我均爲他高興，慶幸。今後，我們雖非同校，但主修是相同的。從他入學後，除了寒暑假外，我們就沒有在一起的機會了。

暑假期間，晚上我們時常去臺大校園裡散步，好像又回到高中時代，重溫我倆放學後，並肩步行一段路程的情形。經過操場上有雙槓與單槓的地方，大眾一定上去玩幾下，他輕鬆自如的動作，令我在旁羨慕不已，因爲我曾經試了一下單槓，結果一上去，整個身子掛在那裡像秤錘一樣，怎麼也拉不上去。他跟我開玩笑說：「你要是報考體專，一定沒希望。」他說的亦是。記得有一個夜晚，也是在臺大校園裡散步時，大眾很憂心地對我說：「蕉森，你將來的情況會比我好。」我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於是他把他的理由向我說：「你哥哥是空軍飛行官，自立了，你弟弟喜歡唸書，在校成績又好，所以你都不需要爲你兄弟的未來擔心。」接著說：「我的情形就不同了，我有五個弟弟，他們的個性都不像你弟弟那樣好好地唸書，等到父母親老了，要靠我一個人，你看我的責任有多麼的重，怎麼得了？我可不憂心嗎？」從大眾所言，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很有責任心，愛護弟弟及照顧家的人。我當時不知如何替他解憂，祇好說：「現在言之過早，到時候不一定如你所想像那個樣子，何況人各有命呢！」

我比大眾早一年大學畢業，我們都當過預備軍官，而且也均在社會上服務一段時期之後，才先後來美留學。一九六三年的春假期間，他從堪薩斯州（Kansas）特地來馬里蘭州（Maryland）看我，這是我們分別四年後的初次會面，異國相逢，相見甚歡，竟夜促膝聊天。一九六四年秋，他轉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，與我相隔較以前近多了。那年夏，我已開始就業於IBM。十月間的一個週末，我駕車去看他，還帶他坐我的車子出去兜兜風，他的精神，氣色各方面都很好。我跟他說：「今後，我可以常常利用週末來紐約看你。」

他回我說：「真好，真好。」臨別時，他若有所思的樣子對我說：「蕉森，我的壓力很重！」我倒輕輕鬆鬆地回答他：「不要擔心，我做事了，你需要錢，我這裡有，專心把書唸好就行了！」

歸途中，我腦子裡老是在想著，大眾所說的那句壓力很重的話。其實，我很能體會，因為我們不但有相同的家庭背景，而且來美求學，打工謀生與寄錢回家的種種艱辛，我是一位過來人。

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的一個晚上，一位與大眾住同公寓的同學來電話說，大眾有病住院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即告假去紐約探望大眾。我到醫院見他時，他還在昏迷狀態中，護士說他得的是腦充血症，心想這豈不是與壓力有關嗎？我曾試了幾次叫他的名字，也沒有絲毫反應。我在床旁一直陪伴著他，無能為力，祇好默禱，希望他快一點甦醒過來。我想得很多，我是他在美唯一親近的人，我要為他事先計劃，日後他出院的種種安排，如復健，居住，學業，還有與他的家人聯絡等等。護士早已換了班，天亦黑了。我離開醫院前，把我的地址，電話號碼以及我與大眾的關係告訴了護士。

那個年代，我在臺北的家還住在大雜院裡，沒有電話可以馬上聯絡。我駕車從醫院回到馬州已過半夜，就立即執筆寫信，向在臺北的父親報告大眾的病情；並請暫勿告訴大眾家人，以免過度驚慌，無濟於事。

每隔一兩天，我必定打電話去醫院查詢大眾的病情。在聖誕節前幾天，護士在電話中說他已醒過來了，我高興之至。第二天立即上紐約，去醫院看他。他真的不昏迷了，亦認出是我。但從他談話中，感覺出來他的記憶力還沒有恢復正常。他知道這次病得不輕，出院後需要休養。我說：

「我打算把你接到我那裡去，跟我一起吃住，一切都沒有問題，你可以安心休養，等到你完全復原之後，再回學校唸書，這樣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很好，我願意去你那裡。」他這樣回答我，似乎頭腦還很清醒。我聽了更覺得高興，有希望了！告別時，他問我：

「你還沒有讓我家裡知道吧？」

「沒有，現在更不需要告訴你家裡了，免得他們擔心。」我是這麼說的。

「對，對。」他亦同意我的想法。

一路上駕車，我的心情很好，回到馬州。元旦（1965）過後，元月三日，晚上電話響了，對方說是紐約的醫院，我馬上全身緊張起來，他告訴我：「我很抱歉，要讓你知道，王大眾先生已經去世了，希望你儘快來。」放下電話，

簡直難能接受這個事實。上個禮拜跟大眾講話時還好好的，怎麼這幾天起了這麼大的變化；萬萬沒有想到的是，上次竟成為我倆最後一次的會面與對話，哀痛之情，無法言喻。但理智告訴我要冷靜，因為明天一早，我就要去紐約辦一件我從未辦過的事——喪事，亦是為大眾做最後的服務，以及與他作永久的告別。即使如此，但十八年累積的往事，在我的腦際，不斷地一一呈現出來；理智阻擋不了我的淚水，哀傷驅走了我的睡眠！

元月四日出發前，先疾筆函稟父親有關大眾之惡耗，並請父親設法通知王家。中午，我到達醫院後，令人心酸的是，這次我看不到大眾了，他早已進入醫院的太平間。俟我將有關文件簽字後，醫院才能通知殯儀館，把大眾遺體運走。晚間我去他生前的住所，收拾遺物，見物生情，哀泣難以抑止；我帶走一些較重要的東西，日後寄回在臺北的王家，其餘的，煩請那位同住同學全權處理了。

五日早晨，紐約的天空正下著大雪。喝了咖啡後，我冒著大風雪，駕車去殯儀館。途中思潮的起伏，有如車前玻璃窗上的那兩把清雪的刷子，沒有停止過。抵達後，進入靈堂，除了大眾的棺木外，空空洞洞，沒有世俗的輓聯，輓花與簽名簿，祇有我這個他生前多年的好友同窗，跪在他棺木前，瞻仰他的遺容。回首前塵，涔涔淚下，有無限的哀思與感傷！一小時後，我駕車，開著車燈，跟隨著在我前面的殯儀館的靈車，它載有大眾的遺體與棺木，在風雪中，小心地開往火葬場，這是我與大眾永別的一段路程。在這異國大風雪的時刻，格外顯得淒戚與哀傷。出殯的車隊雖短，但送殯人的哀痛之情，卻是綿長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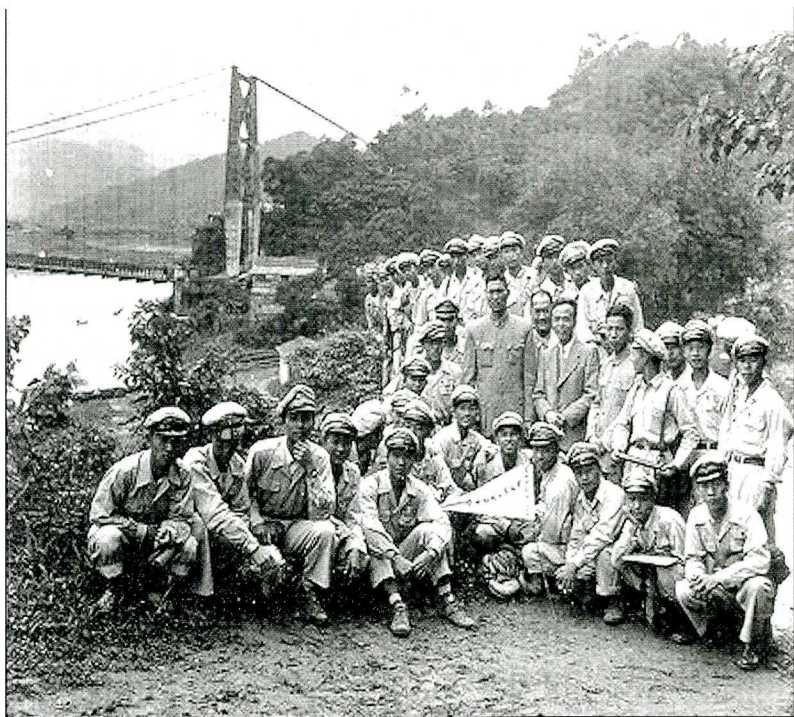
六日下午，我去殯儀館，領取大眾的骨灰罐子。在歸途中，天又下起大雪來，我臨時改變主意，不直接回馬州，去同學公寓那裡再過一夜。因為天寒地凍，太冷了，我不忍把好友的骨灰罐子留在車中，在外過夜；所以自己先進去，徵得臺大同學靳潤生與唐格非的同意後，才雙手小心翼翼地把它端進溫暖的室內，於是我才安下心！

七日早晨，雪已停，是我回去的時候了！我曾經計劃要接大眾來馬州休養，可是今天在我車上的不是他的人，而是他的骨灰，這難道就是天命嗎？在哀傷與疲憊不堪的情況下，回到了自己的住所。我把大眾的骨灰罐子，安放在我書桌上正前方的中間位置，同時在它的前面擺一盤鮮果，然後向它鞠躬行禮。在那一刻，我確有惘然不知所適的感覺。突然間，回想起一九四八年在溫州，與大眾一起上初三國文課，讀袁枚的「祭妹文」，課後我倆淚眼相對的情景。祭文的最後一段中有：「嗚呼！身前既不可想，身後又不可知，

哭汝既不聞汝言，奠汝又不見汝食。」這也正是當時我內心感傷的寫照！

經過與父親書信的往來，商妥寄骨灰的最適當的地址後，我仔細地把它包裝好，用航空掛號寄到父親上班的地方，由父親收轉給大眾的父親。我終於送好友回了家，為卅二歲的王大眾（1933 - 1965）完成了最後的服務！四十一年前的往事，如今回憶起來，仍有不勝哀傷之感。大眾：請安息吧！

二〇〇六年十月六日中秋節於美國馬里蘭州



民國三十九年（1950）十一月十三日成功高中高二甲班郊遊碧潭。圖正中間穿中山裝者是潘振球校長（後曾任救國團主任、教育廳長、省黨部主委），潘校長的左邊穿西裝者是級任導師姚谷良先生（即名書畫家姚夢谷先生），站在潘校長與姚導師的中間後面是訓導主任曾憲鎔先生（後曾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文化專員）。前排蹲著的學生右四是作者季蕉森，右五是黃國樞，右六（在潘校長右前）就是王大眾。